

臨鐵臨新注



《盐 铁 论》新 注

沈阳第一机床厂
辽 宁 大 学 《盐铁论》注释组

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七五年·沈阳

《盐铁论》新注

沈阳第一机床厂《盐铁论》注释组
辽宁大学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2 印张：12 1/2

字数：300,000 印数：1—50,000

1975年5月第1版 1975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2090·33 定价：0.80元

出版说明

《盐铁论新注》是我省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普及、深入、持久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遵照毛主席关于“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的教导，经过近半年的研究和注释所获得的成果。注释中，力求做到古为今用，总结和吸取西汉时期，特别是盐铁会议上儒法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斗争服务。

承担这项注释任务的各市、地和沈铁以及省直机关等单位的党委，都把这项工作当作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一项重大任务来抓，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了老、中、青和工农兵、专业工作者、领导干部三结合注释组，前后共有六万九千二百余人参加。沈阳、本溪、旅大、辽阳、丹东、朝阳、锦州、营口、盘锦、沈铁、省直机关和南票矿务局共注出计四百余万字的十二种《盐铁论新

注》本；阜新选注了全书六十篇中的三十篇；铁岭、抚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二八〇部队、三二八二部队和辽宁省军区注释小组各选注了若干篇。本书以沈阳第一机床厂和辽宁大学组成的联合注释组的注释本为基础，充分吸取了全省注释的有益成果。

《盐铁论》有各种旧版本，经过反复研究，本书确定以清代张敦仁复刻涂祜本为底本，并参照明、清以来各种版本，对其中一些字、句做了校改。为方便工农兵阅读，原文中的古体字、繁体字、异体字，一般都改为今体字、简化字和常用字，少数如改动有损原意的则做了保留。

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注释《盐铁论》，是一项艰巨、细致的工作，因水平所限，难免有许多缺点和错误，有些问题也还有待于继续深入研究和讨论。热诚希望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前 言

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八十一年）二月，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伙同其党羽杜延年，在京都长安召开了一次盐铁会议。会上，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代表的法家人物，对奴隶主复辟势力总头子霍光操纵儒家六十多个贤良、文学，妄图改变汉武帝时期实行的法家路线和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汉宣帝时，桓宽根据盐铁会议记录整理编著的《盐铁论》，以对垒论战形式记载了桑弘羊等法家人物在辩论中的发言。尽管这本书的作者表现了明显的儒家的倾向，但是，他对盐铁会议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却作了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描绘。因此，这本书仍然是我们研究当时儒法斗争和阶级斗争历史经验的一部重要著作。

马克思指出：一切过了时的社会力量“在咽气以前还要作最后的挣扎，由防御转为进攻，不但不避开斗争，反而挑起斗争，并且企图从那种不但令人怀疑而且早已被历史所谴责的前提中作出最极端的结论来。”

（《反教会运动。——海德公园的示威》）盐铁会议上的这场斗争，就是由腐朽没落的奴隶主残余势力挑起的。争论的中心是要不要继续实行盐铁官营，实际斗争却扩及经济、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各个领域。虽然奴隶主阶级的复辟势力在这次会上来势汹汹，恨不得一举夺回他们丧失的全部权利，但是，桑弘羊等法家一派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勇敢坚持反复辟斗争，终于使他们的黄梁美梦完全破产。

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剥夺了残存的工商奴隶主的生产资料，基本上完成了所有制方面的封建化过程，深挖了没落奴隶主阶级复辟旧制度的基础，这是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重大措施，是对奴隶主阶级的沉重打击。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贤良、文学，为了复辟奴隶制，攻击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本义》）提出“罢盐铁，退权利”（《水旱》）的反动口号，甚而要“分土井田”，（《力耕》）妄图破坏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桑弘羊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奴隶主复辟势力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阴谋颠覆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企图。他从贤良、文学的猖狂表演中，看到了当年那些冶铁、煮盐、采铜、铸钱，“财过王者”、“富埒天子”（《汉书·食货志》）的暴发户，在他们枯骨已朽之后，又借儒家之尸还魂来了。桑弘羊认为，盐铁等项事业是立国的“霸王之

资”，“人君统而守之则强，不禁则亡”。（《刺权》）要卡死工商奴隶主重新上台的道路，防止他们“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复古》）必须坚持实行盐铁官营，对他们寸权必争，寸利不让。桑弘羊坚持盐铁官营的斗争，对于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具有重要意义。

汉武帝采取“强本干，弱枝叶”（《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的方针，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分裂复辟势力，是巩固和加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有力保证。对此，儒家之徒恨之入骨。在盐铁会议上，他们迫不及待地要一口吐出被打掉王冠的诸侯王和沦为破落户的老工商奴隶主丧权失利的满腔仇恨，大肆攻击法家坚持加强中央集权，推行法家路线，是“残贼之政”，污蔑掌权的法家人物“擅权而断击”，（《国疾》）“盗秉国法”。（《褒贤》）他们这些卑劣行径，就是妄图篡权复辟。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法家，看他们的来头是要搞一场“宫廷政变”，让秦朝二世而亡的悲剧在汉昭帝时代重演。针对儒家这种毁灭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罪恶妄想，桑弘羊勇敢地捍卫汉武帝的法家路线，痛斥贤良、文学是妄图使“宗庙隳亡”的赵高一类。桑弘羊深刻阐述了实行新兴地主阶级法治的必要性，无情地批判了儒家宣扬的以“礼让”为基础的“君子国”的骗人鬼话，指出“除秽锄豪”，（《轻重》）“久守其国”，（《诏圣》）非有刑罚不可，至于

“讨暴卫弱，定倾扶危”（《备胡》）也都离不开暴力。贤良、文学为了反对法治，在会上公然污蔑法治造成了所谓“海内同忧而俱不聊生”，叫嚷“高墙狭基不可立”，“严刑峻法不可久”，对桑弘羊进行威胁；而桑弘羊毫不畏惧，断然主张对复古派必须坚持“绳之以法，断之以刑”。（《大论》）

汉武帝以武力抗击我国北部匈奴奴隶主军事集团对中原地区的侵扰，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加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然而，代表分裂倒退势力的贤良、文学，怀着借用匈奴力量复辟奴隶制的险恶用心，在会上竟然污蔑抗击匈奴的斗争是劳民伤财，多此一举。他们口唱“去武行文”的老调，为的是阻挠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桑弘羊严厉驳斥这群儒生的荒谬论调，指出抗击匈奴是“以义伐不义”（《论功》）的正义战争，是“当世之务，后世之利”，（《结和》）充分肯定了汉武帝抗击匈奴的历史功绩。桑弘羊在剖析儒家的“废力尚德”的反动叫嚣时，深刻阐述了“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险固》）的精辟观点。斗争的结果，使儒家鼓吹对匈奴的“厚币结和”的妥协路线彻底破了产。

汉武帝以法治国，不守旧术，应时变治，不重儒生，创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文治武功。在盐铁会议上，儒家为了否定汉武帝的法治路线，他们大肆美化奴隶主

统治的社会，说那里是一切都好，人们“各安其居，乐其俗，甘其食，便其器”，（《通有》）简直是地上的天国。这伙儒生说回到古代去是唯一合乎“天心”的正道，否则就要受到天的惩罚，借此狂热鼓吹唯心主义的“天人感应”论，贩卖“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无耻地吹捧孔老二，妄图用儒家的孔孟之道牵着人们走历史的老路。桑弘羊以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和进步的历史观为武器，狠批了儒家的这种反动谬论。他说明，天没有意志；一切事物都在由始而终、由极而衰地运动变化着，根本不存在“百世不易之道”，治理国家只能顺应历史的发展，“异时各有所施”。（《大论》）在桑弘羊看来，儒家从来都是只知“抱枯竹，守空言”，（《利议》）“道古以害今”（《遵道》）的顽固派。他把斗争锋芒直指孔老二，撕下了这个“大圣人”的画皮，还他以“强”、“贪”、“愚”、“耻”的本来面目，指出象他那样的顽固派头子，四处碰壁，后来秦始皇无情惩罚他的门徒，“燔去其术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利议》）都是理所应当。桑弘羊在批判儒家时，对于先秦以来的法家商鞅、荀况、韩非、秦始皇及汉代法家代表人物，在建立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过程中所做的贡献，都作了充分肯定，并以自己能做这个传统功业的继承者自豪。

盐铁会议上儒法两家从各个方面展开的这场论战清楚地表明，这是社会两个对抗的阶级之间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生死斗争。汉武帝代表新兴地主阶级为巩固本阶级的专政、防止奴隶制复辟，做出了很大贡献。而桑弘羊在会议上所坚持的正是汉武帝的法治路线。“但见丹诚赤如血，谁知伪言巧似簧？”不管贤良、文学怎样乔妆打扮，摇唇鼓舌，也掩盖不住他们改变汉武帝法治路线的凶相。从儒家的行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要原封不动地恢复奴隶主在农、工、商领域的占有制；他们要法家改弦更张，恢复奴隶制“封君保国”的政治制度；他们要西汉政权听凭匈奴奴隶主军事集团把奴隶制强加于中原先进地区；他们要使那种乱国害民的孔孟之道自由泛滥。凡此种种，无不贯穿着一个险恶的政治目的：推翻新兴地主阶级专政，全面复辟奴隶制。但是反动派在本质上都是虚弱的，所以当桑弘羊等法家对儒家的复辟谬论痛加驳斥的时候，那些自谓不可一世的“巨儒宿学”，便丑态百出，理屈词穷，“不能自解”。斗争的经验证明，革命的阶级只要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坚持革新的路线，积极进取，不受那种“功业已立，垂拱无为”（《申韩》）论调的迷惑，不论妄图复辟的势力怎样气焰嚣张一时，最终失败的必定是他们，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

盐铁会议上出现的这场激烈斗争，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是汉初以来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事实表明，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产生后，它不可避免地要带有旧的残余。汉承秦制，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不断巩固，但是在经济、政治、思想各个领域还都遗留着奴隶制的痕迹，不仅旧的奴隶主残余势力有存在的条件，也有产生新的奴隶主及其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的土壤。汉初作为残存的旧阶级一部分的工商奴隶主，还保有已往的剥削手段；同时高祖刘邦建立起新的统一的封建王朝之后，还不得不实行那种“郡国居半”的暂时体制，相当程度上保留了旧政治制度的残余。为了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汉高祖根据前代的历史经验，对工商奴隶主采取多种抑制措施，并逐步消灭反动的异姓王。被打击的工商奴隶主与反动的异姓王勾结在一起，在匈奴奴隶主军事集团资助下，发动武装叛乱。代王陈稀的叛军将领，就是清一色的工商奴隶主。汉景帝时，掌权的法家进一步认识到藩王和工商奴隶主对新兴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威胁，采取了“削地弱藩”的对策打击他们。以吴王刘濞为头子的“吴楚七国”之乱，就是诸侯王与工商奴隶主勾结在一起搞的一次武装叛乱。这次叛军中的骨干也大多是铸钱、冶铁、煮盐的工商奴隶主。发展到兵戎相见，目的还是争夺政治、经济上的统治权。汉

景帝平定了这次叛乱。但是平叛的结束，却不是反复辟斗争的完结。因为奴隶制复辟的土壤还存在，复辟阶级的代表人物还在不断产生。

汉武帝继景帝之后，把反复辟斗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兴地主阶级政治家，继续以前几代人开创的事业，依靠张汤、桑弘羊等一大批法家，深入地进行清除奴隶制旧基地的斗争。实行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平准、均输、算缗、告缗、禁止私人铸钱、不准商贾占有田地等等，这是运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改变工商奴隶主的所有制，巩固和发展地主阶级所有制的进步措施。以“推恩令”的办法削藩，“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汉书·诸侯王表》第二）从此诸侯王再也无力充当复辟首领的角色了。这时，朝廷的高级官吏中，相继产生出一部分属于奴隶主阶级利益的代表人物。大农盐铁丞孔仅、御史大夫卜式、大农令颜异等，他们都是因为站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顽固反对汉武帝加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路线而分别受到撤职、贬逐、杀头处罚的。但是，旧制度的维护者从来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遭到汉武帝沉重打击的奴隶主复辟势力，在汉武帝去世六年之后，便凭借他们存在的土壤和复辟条件，在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谏大夫杜延年这些新产生的复辟势力的政治代表策划下，以“问民间所疾苦”（《本义》）作

幌子，召开盐铁会议，刮起复辟倒退的黑风。他们企图在新的形势下，得到代王陈稀、“吴楚七国”的叛军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霍光一类标榜搞盐铁会议旨在“顺天心”“悦民意”，修“宽和”之政，（《汉书·杜周传》）这十足表明他们是在利用手中的政权，使破了产的奴隶主重操旧业，使一切妄想开历史倒车的人，都随心所欲地走回头路。然而历史的规律决不按反动派的意愿办事。桑弘羊等法家利用盐铁会议的讲坛，把奴隶主阶级复辟倒退的政治阴谋在大庭广众之下揭穿，在朝臣之中造成一种反复辟倒退的强大舆论，所以不论他们怎样垂死挣扎，这幕复辟丑剧还是免不了以他们的失败而告终。

盐铁会议上法家的胜利，对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反对儒家复辟奴隶制、保证法家路线继续推行起了重大作用。桑弘羊坚持法家路线，在这场斗争中英勇奋战，成为汉武帝死后捍卫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杰出代表。**“革命愈深入，旧制度复辟就愈困难，即使发生复辟，保留的成果也会愈多。革命把旧地基掘得愈深，旧制度复辟就愈困难。”**（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正是由于有汉武帝时代对奴隶制旧地基的深入挖掘，有法家桑弘羊等的坚持斗争，所以从汉武帝到汉昭帝时代，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日益得

到加强和巩固，即使发生了象霍光策划召开盐铁会议这样的复辟事件，西汉王朝也有效地避免了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厄运。当然，我们对法家人物的局限性，也必须采取阶级的、历史的分析态度。随着封建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农民的革命斗争也逐步兴起了。汉武帝、桑弘羊这类法家人物为加强地主阶级专政，也有镇压农民革命的一面。桑弘羊把农民起义视为“短针”治不了的“恶疮”，主张“任斤斧，折之以武”，（《大论》）就反映了他的地主阶级本性。

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西汉前期，从汉高祖刘邦建国到盐铁会议召开，已有一百二十多年的时间。这期间，掌权的法家统治者世代相继，一直与妄图复辟奴隶制的反动势力进行不停顿的斗争。他们的全部斗争归结到一点，就是：在封建制社会初期，新兴地主阶级为巩固本阶级的专政，挖掘了奴隶制的旧基地，他们一代一代地坚持革新前进、反对复辟倒退的法治路线。正是这条路线，保证新兴地主阶级专政得以巩固下来。今天，我们为了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读一读《盐铁论》，总结西汉开国以后新兴地主阶级几代人坚持反对奴隶制复辟的斗争经验，对于搞清楚为什么对资产阶级专政，将会得到有益的启示。“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一个新的剥削制度代替另一个旧的剥削制度还要经过几代人的斗争，那么，无产阶级依靠自己的革命专政，要完成马克思指出的“**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历史使命，无疑更要进行长期、复杂、激烈的斗争。社会主义社会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在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要解决这些矛盾，只有坚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告诉我们：“**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小生产的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都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

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这种情况，必须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我们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就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加强马列主义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搞清楚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继续革命，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我国永远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飞奔向前，一直达到伟大的共产主义。